

析中日忌讳文化的差异

桑凤平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 400044)

摘要:由于受自然地理、生活习惯、文化意识及民族心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忌讳文化。围绕中日两国在语言、观念、行为三方面忌讳文化的差异表现,探究其内在的根源,把握中日忌讳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及互补、互动的趋势,借鉴合理的忌讳文化,从而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中日;忌讳;文化;差异;根源;趋势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181-05

建立文明的忌讳文化已成为各民族文明进步的自觉和标志。研究中日两国各具特色的忌讳文化,有助于对两国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并从中找到平衡,相助并长,有效地寻求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更好地实现两国积极沟通的愿望,达成国际大融合的目标,以期推进两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所谓“忌讳”是指基于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或个人心理等因素,对某些语言或举止产生顾虑、忌惮、规避,积久形成防范或禁止之习,或是对某些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言行表示警戒和避让。

忌讳文化包括语言行为特点、思想道德约束和法律法规制约三个层次。语言行为特点,是指生活层面的习惯、规范,如夜间不能高声喧哗等;思想道德约束是指基于理性共同规范,如公共场合不能随地吐痰等;法律法规制约是指国家层面强制约束,如不能虐待他人等。本文只局限在第一个层面,即对生活层面的习惯、规范现象的研究,立足于从一个侧面表现两个民族的生活特性、文化内涵及价值观念等。

一、中日忌讳文化差异的表现

(一)语言交流中的忌讳差异

1. 数字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忌讳使用的两个数字分别是“4”和“9”。日语中的数字“4”的发音与“死”的发音相谐;而数字“9”的发音与日语“苦”的发音相谐。因此,这两个数字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1]。在宾馆或办公楼等建筑物的电梯及楼层上往往没有4层,直接从3层升至5层。若商家出售的房子有4层也会无人问津。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没有特别忌讳使用的数字,尽管从发音上判断中国也有不喜欢4的表现,但远没到讳莫如深的地步。倒是在相声中有将“4”的音乐音“发”视为与发财的“发”谐音的说法。数字“13”、“250”会使人与愚笨、傻的形象联想到一起,却也远不及日本人对“4”和“9”的规避程度。而“9”则是中国人的吉利数字,因为从《易经》开始,“9”就是至尊的标志,长期以来“9”会给人以“长久”、“永久”的口彩感受。

2. 称呼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中的年长者忌讳被外人按辈分、年龄称呼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等。通常只使用先生、女士、小姐等称呼。遇到不清楚对方姓名的场合,日本人也会巧妙地运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进入交流的主题。通常情况下,日本的“老”是年迈、体弱、多病的标志,是需要他人照顾的对象^[1]。而中国的老年人若不被晚辈称呼为“爷爷、奶奶”之类,反倒有种被蔑视的不安。在社会生活中,被称为“老××”,甚至“××老”几乎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 收稿日期:2010-09-10

作者简介:桑凤平(1960-),女,辽宁大连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日语语言文化、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3. 态度上的忌讳表现 在日常交往中,日本人多是采取附和、暧昧的态度,一般不轻易拒绝或否定他人。即使有些事情根本不可能或没有讨论的余地,也会尽量顾及对方的面子,不扫对方的兴。人们对这种空头支票式的态度毫不在意,倒是在无形中起到了一种关系黏合剂的作用,利于增进人们的沟通。而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则远比日本人鲜明得多。行则已,不行则罢。一般情况下,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揣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中国人在处事态度上显得直截了当,简单明了。

4. 内在评价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一般不喜欢主动夸赞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苛求家人和自己的不足倒是常有之事。人们对自己家人以外的人一般是不吝夸赞,从对方的容貌、服饰到工作、家庭都可以不厌其烦地夸赞^[1]。而在中国情况则大相径庭。一个充满和睦温馨的、亲情融融的家庭氛围,往往是通过夸赞自己家人的做法来体现的。尤其对于还在读书阶段的孩子,家长更是不吝使用表扬和鼓励的语言。中国的教育理念提倡“好孩子是被夸出来的”。

5. 沟通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通常具备较强的距离意识,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忌讳直言不讳地袒露心声。日本有着日本文化背景下的“以心传心”的良好感性特征,揣度他人心理的思维模式尤其突出。云里雾里,不让外人了然^[1]。而中国人则多倾向于直言不讳,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特别是在熟人之间更是喜欢将自己心中的不快和不满和盘托出,以发泄和排解消极的情绪,达到放松、释然的目的,追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境界。

(二)价值观上的忌讳差异

1. 消费行为上的忌讳表现 在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中,人们普遍鄙视铺张浪费的行为。觥筹交错、剩余浪费的情景在宴请宾朋时几乎见不到,“定食”(份饭)的就餐习惯既兼顾了营养,又做到了体面、节俭。但在中国的餐厅里,宴请宾朋时,餐桌上剩余饭菜、铺张浪费的现象却司空见惯。中国人的观念中,面子大于一切。有时“死要面子活受罪”。宴请朋友时,若风卷残云地将饭菜吃净,则会陷主人于窘迫,为了面子上过得去,非要剩下一些食物在桌子上,方显主人的慷慨、盛情,体现“富富有余”。除非是自家人在饭店聚餐,一般情况下很少“吃不了兜着走”,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勤俭节约的意识更是淡薄。

2. 借贷行为上的忌讳表现 在日本借钱是一件大事。由于日本人的距离感,使其不愿给他人添麻烦的意识趋强,即“万事不求人”。即使遇到经济拮据的情况,也很少会向他人开口借钱,哪怕是关系要好的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日本人中常有的一句话是“我能为你做什么”。中国人在观念上也倡导“自立”,但在遇到个人经济危机时,往往聚众人力量为己办事,一般首先会想到向亲戚、朋友借钱,如购房、买车等,甚至有“多多益善”的欲望,以显示个人在社会或家庭中的感召力。为未能如期偿还而闹得不快甚至反目为仇走向法庭的事例屡见不鲜,这在年轻一代中尤为突出。

3. 工作态度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以忙为荣,中国人以闲为好。日本的公司职员,通常情况下,即使没有公务应酬,也往往会邀上同事、朋友三五成群地出没于饭店、娱乐场所,直至深夜才尽兴而归。“深夜归宅”在日本人看来是拼命工作的敬业精神的体现。孩子与父亲一周不谋面的情况屡见不鲜^[1]。中国人注重简约、效率,主张“八小时内完成”,甚至推崇“四两拨千斤”、“化繁就简”。中国的上班族不存在下班后直接回家难为情的问题,不直接回家才不正常。只是随着人际交往的频繁,人们的接待、应酬多了起来,现在也有人下班后不直接回家。但多数不是因为工作而加班,而是生活多样化使然。

4. 个性表达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在相互交往中,注意细心地观察周围人的情况,尽量埋藏个人的特殊想法,刻意营造和维持安定祥和的氛围,没有人愿意打破团队的惯例,一般都忌讳突出个性。在工作岗位上,忙忙碌碌的“埋头苦干型”往往是“忠诚”公司的精神化身,人们喜欢按部就班、步调一致。而在中国恰恰会被抨击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只有那些不甘于现状,喜欢别出心裁,突出个性,拥有创意的“点子型”者很受欢迎,被视为有能力、有才干、不同寻常者,往往会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晋升、提拔的机会,成为周围人的核心和主心骨。

5. 服从意识上的忌讳表现 个人的意志就是对价值的判断。同样是科层体制的国家,中日两国的个人意志在权威面前却差异颇大,这甚至影响到价值判断。在服从权威方面,日本人对顶头上司有顶礼膜拜之虞,可谓泯灭了个性而服从权威。在日本人眼中,领导的意志就是一切,下级一般不敢提出异议,更不敢违抗。似乎只有义务而不讲权力。有时明知领导的决策不正确,却违心服从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例子不胜枚举。在上司面前，日语中的“はい”(对，是的，好的等)一词使用的频率从来都是居高不下。中国人的观念中虽也有尊重领导的意识，却远不及日本人那样在上司面前丧失自尊的绝对“服从”。

(三)行为上的忌讳差异

1. 在表达方式上的表现 日本人惧怕掉队的意识突出，一个脱离了集体的个体是无法立足的。日语中有句谚语叫“出る杭は叩かれる”(枪打出头鸟)，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此种心理造就了日本人的团队意识。中国人惧怕随大溜，往往崇尚独树一帜、别出心裁，追求“天生我才必有用”，推崇单打独斗，强调“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日本人以齐步走为好，中国人则以个性化为上。

2. 对环境态度上的表现 日本人在退还租房时，忌讳将肮脏的屋子交给房东^[1]。通常会将房间打扫干净后离开，似乎不是为离开者着想，而是为居住者准备。这一点在中国人的习惯观念中是难以理解的。中国人在退出租房前，一般是不会为下一个租房者考虑的，也不会为其居住的环境好坏有什么歉疚感。

3. 在社会礼仪上的表现 日本人一般很在意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形象问题，其文雅的举止和得体的服饰等，关乎一个人修养、文化及品位的美誉度，人们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1]。但相比之下，中国人有时不太注意自己在商场、公交车上等公共场所的形象，时常出现高声说笑、接听电话等无所顾忌的举止。日本人对这种落拓不羁、豪放有余的举止会投来疑惑不解的目光。

4. 在“面子”问题上的表现 中国人注重自己的面子，日本人则顾及他人的面子。在日本，商家即使收到顾客手中可疑的钱币，也忌惮当着顾客的面查验的做法。即使要检验真伪，也会设法远离顾客的视线，唯恐令“上帝”不快^[1]。中国的商家，一般不在意顾客的面子及其感受，在收到大额钞票时，会理直气壮地当着顾客的面反复查验真假。

5. 在团队行为上的表现 一旦来到陌生的地方时，日本人的做法是首先搜集当地各种信息，如生活、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并不遗余力地分析、分类和说明，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后来到的同胞提供参考。他们十分害怕远离主流，把为同胞提供支持和帮助当作义务，因而有种纵向的“归属感”。而中国人的这种抱团意识却相对淡薄。中国人往往享受孤独，往往提倡“自我奋斗”、“从头再来”。不太在意“前任”的馈赠，也不太留意“后任”的感受。

二、中日忌讳文化差异的根源

(一)发展阶段差异的影响

本质上中国是农业国，农民的生活习惯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养成了优越的自我意识，见了客人尤其熟人便会不计场合地夸夸其谈，甚至先声夺人。因为自给自足的结果是万事不求人，进而形成了自信有余的性格。中国人可以向朋友敞开心扉，袒露心声，以排解心中的不快。日本则长期处于渔猎生活状态，生活交往频繁，尤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构成了谨慎的价值认同。日本人处处小心谨慎，像狩猎捕鱼一般地察言观色和待人处事，一事当前难得作出直截了当的表态，从而形成了最具有日本特色的委婉、暧昧的表达方式。有时，往往因为过分的瞻前顾后而令人产生误解^[2]。

农民生活方式形成了个人落拓不羁的豪放性格。中国农民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艰苦劳作中度过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可供开怀畅饮的日子，既是对辛苦耕耘生活的补偿，也是对生活压力的发泄。在匮乏的经济条件下便产生了酒桌上相互谦让、轮番劝酒的模式，进而形成了好大喜功的面子观。日本则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相对较为丰富，进而已不将吃饭、喝酒视为大事，这就少了一些“酒文化”、“食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还表现在集中消费、暴饮暴食、一曝十寒的聚餐习惯方面。过于看重吃饭问题，强调“民以食为天”。劝朋友“一醉方休”与其说是“面子”问题，不如说是“肚子”问题。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后于中国，但程度深于中国，容易更早更多地接受一些新的饮食结构观念。同时，日本先于中国实行开放，经济状况的提高使其普遍先富裕起来。这点从日本国民的餐桌文化可略见一斑。即使聚餐，也鲜有劝酒的习惯，而是各自量力而行，不必为酒量大小讨来尴尬。而在宴请宾朋时，餐桌上也较之中国要简单节俭许多，往往是实行份饭菜制，量少品种精。“持ち帰り”(吃不了兜着走)的情况司空见惯。时间和实践都说明愈是经济发达，愈是看淡吃饭的事情，愈是能理性地对待消费。

(二)地理环境差异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表现为环顾左右、应有尽有,甚至产生为所欲为的自信。农耕社会使人缺少危机意识,只要风调雨顺,就可生活无忧,甚至敢于奢靡浪费,这是一种民族心理。而日本的岛国意识深重,自避一隅,四顾茫然^[3]。尽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个单一民族不但延续了下来,而且发展和强大了起来,必有其内在的力量。但毕竟生存的危机压力大,对诡异的大海肆虐的天气充满敬畏,对征兆性的东西格外敏感多疑^[4],这就容易产生经验性或归纳性的思维习惯,一些宗教色彩甚至迷信色彩的观念会自然产生,便有了一些对数字和语言的警示和禁忌。

农耕文明给人的机遇基本相同,各家各户的生产、生活水平也相当,养成了稳定的家庭结构,进而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家族是家庭的放大,从而形成了君臣父子之伦理。尽管从外部看等级鲜明,但内部还是其乐融融。几代同堂是人们共同的理想,国泰民安是社会的目标。一个人若被称为“爷爷”、“奶奶”之类,即使不真实,也反映了一种社会认同。其本质上是社会或家庭宝塔顶部的象征。而日本的渔猎文化有靠运气的企盼,但个人的作用毕竟有限,个人的智慧、体力、意志往往在集体中才能得以发挥。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海上有大作为。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战斗力,是一个人被团队接纳的前提。而希望被人视为年轻的心态本质上就构成了日本人怕掉队的价值追求,这是日本人不服老的民族心理^[1]。

中国的农耕文化意识带来靠天吃饭的观念,表现为逻辑性、因果性强,便有心地坦然、从容的态度。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势众,自古以来都是首屈一指的强国。自大的心理助长对外缺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中国的文化大多是对内的思考,对人的自我反省。日本人则身居孤岛,民族单一。为图自存,造就了日本人奋发图强、崇尚集体主义、坚韧不拔的个性^[3]。但也正因为如此,近代“舶来品”的西方文化特质又造成日本的文化缺乏内涵,缺乏包容与博大,缺乏理性的思维和对世界的应有关怀。日本特有的孤芳自赏的环境,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表现在对工作重视的态度上,下班后忌讳直接回家,即使无需加班加点,也会制造工作繁忙,在公司受器重的假象。孤岛文化使日本对外交往相对较少,而日本国内的人际交往频繁,唯恐陷入孤独,表现为团队意识超强。在表达拒绝方面,禁忌直接采用“NO”的方式,唯恐产生排斥作用。中国基于自给自足的大陆文化,产生了不太顾及他人感觉,而果断表达取舍的观念。中国天然富足的农耕经济,使得人们能够率性、自信地面对一切,甚至商家不避讳当着顾客的面检验钞票的真伪。日本人心理上的谦卑、忧患,形成了委曲求全的观念,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即为喜欢随声附和,以赞扬为主;又表现为处处小心谨慎,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尽可能不给他人添麻烦^[2]。中国式的富有个性、“点子王”之类,在日本人眼中或许只是离群索居的另类象征。

(三)生活方式差异的影响

中国宗法社会的根源是以家庭为单位,而国家则是家庭的放大。日本的渔猎文化模式则是冒险加机遇。时来运转则有收获,否则便两手空空。日本的内部独立性强,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形态更突出。中国人对内依赖对外独立,个人在家庭内部可不分你我,大家相对平等,但出门在外则独立独行,“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他人的信任意识相对较弱。而日本对内独立,对外团队。一个人的作为是价值所在,人格色彩浓,但必须在集体中才能得以表现。而一旦离开家庭或家族、国家,则相互依赖,相互支撑。中国人把家视为“港湾”,既是“温暖小窝”,当然趋之若鹜。日本则在家内分工明确,形成了绝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男人们下班后忌讳直接回家,本质上是分工使然,是责任使然^[5]。

中国农耕文化往往表现为自给自足,自得其乐。演化在社会生活中就是说话做事直截了当,即“钉是钉,铆是铆”,但内敛不足,甚至在公开场合也大声大气,旁若无人。因为谈笑说话在中国往往被认为只是形式,是表现,不是内容,也就“不拘小节”了。日本人的渔猎文化则是建立在合作、互助的基础之上,自立则不成,体现在文化上则为说话让三分、“有理也让人”的谦和。

中国农耕文化重必然性,表现为因果分明,功过分明,只要播种就有收获,遑论好坏,进而有了预期,有了等待,也有了信心。经济上的“敢借敢还,好借好还”也是信心的表现。日本的渔猎文化是多偶然性,多机会主义。忧患意识强,危机感就强。不愿意借钱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亦是缺乏还钱信心的表现。将住过的房子打扫干净固然是文明之举,但体现了一种唯恐负于他人,给他人带来麻烦的心理。

三、中日忌讳文化互补、互动的发展趋势

首先,对糟粕性忌讳的破禁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对固有的尤其是糟粕性文化

扬弃的过程。中国如此,日本亦如此。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很难想象中国人穿着长袍马褂上班的样子与日本人穿着木屐的效果。因为职业装不仅是统一整齐的符号,更是生产规模化、统一化、效率化的表现,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和选择。历史不允许倒退,从忌讳文化上看,凡是束缚人们进步的生活生产方式,不管其多么“经典”,多么传统,都会水到渠成地被破除。

其次,对合理忌讳文化的借鉴和渗透,是民族间、甚至国家间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文化无国界,只要是对人类有益处的,都会被人们相互借鉴。当前,日本正流行汉语热,甚至中国一些自我摒弃的东西却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如在中国孩子中并不流行的中国象棋在日本却深受欢迎;中国孩子越来越陌生的珠算、书法在日本已成为孩子们的必修课,以至于有美国人提出“书法源于中国还是日本”的疑问。同时,中国以“卡拉OK”为代表的文化活动包间的私密化和分餐制的日益畅行,又体现了浓厚的日本色彩。毋庸置疑,忌讳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已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其三,对文明忌讳文化的建立已成为各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忌讳作为一种忌憚、防范和规则,有着文化进步的积极意义。剔除旧的糟粕忌讳表达,借鉴合理的忌讳现象,以及创建全新的忌讳范畴,是文化的进步,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一般场合可以不着职业装和礼服,无疑是礼仪表达的一种进步,这对日本一年四季西装革履的官员形象无疑是一种冲击。文明是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之上的,能体现节俭意义的着装要求,应该比过度形式化的着装观更具进步性。中国“五四”以来的姓氏个性化也较日本的“妇随夫姓”来得进步。当前,日本妇女运动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姓氏个性化,不能不说是受中国的影响。当然,同样基于节俭美德的崇尚,中国人餐桌文明的出现,着实受到日本分餐制和“打包制”的影响。日本人在节能方面的精打细算和不厌其烦,对中国人“地大物博”的好大喜功观念也带来了挑战。目前,中国政府强制性地建设领域推行保温材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理念的进步。

基于忌讳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任何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禁忌、防范和规避,将其归纳和升华就是一种规则,一种文明,甚至是一种“格”。同时,作为文化家族中的成员,忌讳又不是单一、孤独的现象,其自我发展中应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求。对于中日忌讳文化进行比较,不仅为探寻二者的共性、个性,更希望明辨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糟粕的标准。最终目的是于文化交流中弘扬先进文明的忌讳文化,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要素,从而拒绝落后无为的忌讳现象,以共创和谐文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桑凤平. 论日本忌讳文化的渊源及内涵[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1(1): 41-44.
- [2] 桑凤平. 日语多重表达的文化价值[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5(4): 148-151
- [3] 杜君林. 浅谈日本人的危机感[J]. 广角, 2010(5): 206-206.
- [4] 杨杰兰. 地理环境对日本文化的影响[J]. 时代文学, 2010(6): 179
- [5] 金伊花. 浅议中日思维习惯的差异[J]. 科技信息, 2009(33): 1027

责任编辑 张颖超